

作者型文本视域下《金锁记》英译批评研究^{*}

李广荣

扬州大学，扬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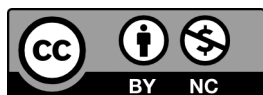
摘要 | 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然而《金锁记》由张爱玲译成英文后最初在英语世界并未得到认可，其中原因是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不少学者将其归咎于张爱玲的语言能力。本文从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出发，提出《金锁记》是作者型文本，陌生化是这部小说的艺术特色，主要体现在小说内容的创新和形式的创新两个方面。这类文本要求读者参与文本意义的创造。翻译这类文本，译者应当尽量保持原文文本的能指链，保留其无限复数的含蓄意指，让译文读者有机会在阅读时有极乐的阅读体验。因此张爱玲在翻译时采用的异化翻译策略是恰当的。异化翻译的译文可能欠通顺流畅，并且挑战读者的阅读习惯，但并非张爱玲英语能力不强，表达不够地道。

关键词 | 《金锁记》；作者型文本；陌生化；异化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一、引言

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小说家，其地位得到中外文史学家的一致认可。朱栋霖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40年代小说中专门用一节的篇幅，详细介绍张爱玲的作品，阐述其风格特点和文学成就。同样，美国文史学家耿德华（Edward M. Gunn）在《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中，用更大的篇幅剖析了张爱玲小说的时代背景、人物性格以及艺术特色。华人学者夏志清认为：“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该是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

作家。”（2012：254）至今，关于张爱玲的传记就有数十种之多。《金锁记》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也是批评家们不竭的灵感来源，曾经被各种文艺批评流派的显微镜和放大镜观察、剖析。傅雷称《金锁记》“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至少也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金宏达等，1996：410）夏志清认为“《金锁记》长达50页，据我看来，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2012：261）然而，当初《金锁记》译成英文后，并未在英语世界的读者中产生较大反响，其在英语世界传播遇冷是日后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诸多论述

^{*} 基金项目：江苏省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张爱玲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19WWTB005）。

中,不少学者把《金锁记》在英语世界传播受阻归咎于张爱玲的语言能力。葛校琴(2013: 79)和李欧梵(2010: 90)都认为张爱玲的英语不够地道,存在许多中式英语表达。把《金锁记》选入其主编的*Modern Chinese Stories and Novellas*的刘绍铭曾经问该书责任编辑Karen Mitchell女士对《金锁记》译文的看法,她说:“张爱玲的英文不错,只是故事中对白有点不自然。People don't talk like that.”(刘绍铭, 2007: 110)然而,其他一些学者对张爱玲的英文能力则持不同观点。20世纪50年代,张爱玲在香港为美国驻港总领事馆新闻处从事翻译工作,其负责人麦卡锡那时与张爱玲在翻译和创作上有过深度交往,他说:“初读《秧歌》头两章,我大为惊异佩服。我自己写不出那么好的英文。我既羡慕也忌妒她的文采。”(高全之, 2015: 166)事实证明麦卡锡的赞誉并不为过。《秧歌》在美国出版后,受到好评。“《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用了‘mastery’这个词,意思是张爱玲的英文是属于大师级的,连一些土生土长的美国人都自觉不如。”(宋以朗、符立中, 2013: 47)这些名家学者对张爱玲的英语能力提出了不同观点,谁是谁非抑或见仁见智?《金锁记》在英语世界没有得到广泛认可,是语言问题还是翻译策略问题?根据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本文认为《金锁记》属于作者型文本,英译《金锁记》体现的中英杂糅的文体特点是翻译决策选择的结果,和张爱玲的语言能力关系不大。

二、文本类型学及罗兰·巴特的读者型文本和作者型文本

文本类型分析是翻译研究的一个传统。不同的文本类型需要不同的翻译策略。第一个区分不同类别翻译的是德国的施莱马赫(Schleiermacher)。他把翻译活动分为“一般释义”(mere interpretation)和“真正的翻译”(Snell-Hornby, 2006: 9)。“一般释义”指一般日常事务文本的口译和笔译。“真正的翻译”是指学术文本和艺术文学文本的翻译。他认为只有“真正的翻译”才值得关注研究。对于艺术文学文本的翻译,他提出了两条不同的路径。“译者要么尽可能让作者待在原地不动,把读者带到他身边;要么让读者待在原地不动,把作者带到他身边。”(Lefevere, 2005: 149)后来韦努蒂将其发展为“异化”和“归化”两种翻译策略。两种翻译策略各有优势,施莱马赫主张

“创建一种倾向类似外国语言的语言,也就是‘委曲’目的语的语言,想方设法让翻译带有异国的味道”。(Snell-Hornby, 2006: 9)首先建立翻译文本类型学理论的是德国学者凯瑟琳娜·莱斯。她根据语言学家布勒(Bühler)的语言功能理论,提出强调语言描写功能的内容聚焦型文本(content-focused texts),强调语言表达功能的形式聚焦型文本(form-focused)以及强调劝说功能的感染聚焦型文本(appeal-focused)。形式聚焦型文本一般指文学文本,莱斯认为翻译这种类型的文本时,“直译习语或者谚语是恰当的——翻译比喻特别是作者独创的比喻应当采用同样的方式——只有当这种翻译特别别扭或者不可理解时才能使用语义相近的普通语言进行翻译”。(Reisse, 2004: 37)同样彼特·纽马克也是根据布勒的语言功能理论,将文本分为表达型文本,信息型文本和召唤型文本,并且详细阐述了各种文本类型所包含的文本种类,严肃文学属于表达型文本,应该采用语义翻译的方法。他提醒译者在翻译严肃文学这类表达型文本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具有作者个性色彩的成分,如:不寻常的搭配、原创的比喻、‘不可译’的词汇、特别是要在译语中用两三个词才能翻译的表示‘质地’的形容词、不合常规的句法等等”。(Newmark, 2001: 40)语义翻译倾向于源语语言和文化,原文特色能保留的尽量保留。

上述翻译的文本类型学理论都建立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基础上,主要将文学文本和非文学文本区分开来,并提出相应的翻译方法。文学作品作者的意图是译者理解和表达的终极目标,并且读者的反应也是译者考量的重要因素。然而这些理论没有触及文学文本之间的差别。文学文本千差万别,在翻译中应该区别对待。在现代派文学作品中,作者意图并不是作品最权威的解读,甚至作者意图根本不被承认。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将文学文本的划分向前推进了一步,为在译文中注重再现原文的形式意义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依据。

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其实是一种创作与阅读理论。他首先从创作的角度把“作品”和“文本”区分开来。传统观点认为“作品”是作者创造的,作者对作品拥有绝对的权威。而巴特的理论则颠覆了这种观点,提出“文本”的概念,认为作者不是文本的生产者。“现代作家(scriptor)则截然相

反，他与文本同时诞生，绝对不是先于写作或超越写作的存在，不是以其作品为从属的主体。存在只是阐述的那一刻，并且只有此时此刻文本才被写作。”（巴特，2004：68-69）文本的意义永远处于不停息的编织过程中，需要读者和作者合作。那么哪些文学作品能够吸引读者参与意义的生成和创造呢？这就涉及对文学作品的评估。巴特认为：

“我们的评价只能和实践相联系，这个实践就是写作的实践。一方面，存在一种可写的；另一方面，存在一种不再可写的。”（Barthes, 1970: 4）可写的文本就是作者型文本（writerly texts），不可写的文本就是读者型文本（readerly texts）。屠友祥把“writerly texts”译为“引人写作者”或许更为直观地表达了该术语的蕴含，就是读者在阅读一个文本后，继续该文本意义的生成和编织；而将readerly texts译为“能引人阅读者”。作者型文本正是我们应该倍加珍视的，“因为文学工作的目的（作为工作的文学）是让读者不再是文本的消费者，而是文本的生产者”。（同上）读者型文本是产品，而不是生产，培养的是消费者。文本的消费者是被动的，只有接受文本或者拒绝文本的自由，而没有进入能指过程，享有写作的乐趣。读者型文本也称传统文本，通俗小说、浪漫派和现实派等大多数作品可归为此类。从文本对读者的影响来看，巴特把文学作品分为“快乐的文本”和“极乐的文本”。读者型文本只能带给读者一般的快乐，而作者型文本却给读者带来销魂的极乐体验，这也是对其参与意义创造的回报。

综上所述，巴特的文本分类与此前翻译文本类型学是一脉相承的，区别在于：巴特对文学文本进行了更加精细的定性分析和描述，区分了传统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作者型文本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理论内涵对翻译作者型文本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作为作者型文本的《金锁记》文体分析

读者型文本一般有固定的模式套路，能够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倘若我们欲与古典之文（既读者型文本）同步并行，就必须看牢直接意指，这位老迈的神，首鼠两端，满腹机关，举手投足，全是程式，派定了表演群体语言通体的纯正。”（巴

特，2000：68）与此相反，作者型文本则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这种新奇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文本的原创性，作者型文本是绝对复数意义的文本，复数意义在阅读中不断生成、消失；第二是解释的无限性，“在这理想之文内，网络系统触目皆是，且交互作用，每一系统，均无等级；这类文乃是能指的银河系，而非所指的结构”。（巴特，2000：62）

（一）《金锁记》的原创性

《金锁记》的作者型文本特征首先体现在其原创性方面。既然作者型文本具有无限的含蓄意指，而含蓄意指是“一种反通讯（countercommunication）（文学是一种故意的乱拼误写）”（巴特，2000：68），那么它就具有诗学的陌生化特点。“陌生化”是艺术化的使用语言形式，使读者或者观众对一些司空见惯的、习以为常的事物突然产生新鲜的、前所未有的感觉。（Cuddon, 1991: 226）《金锁记》的陌生化可分为形式的陌生化和内容的陌生化。

形式的陌生化首先表现在张爱玲独创性的语言使用上，其风格被誉为“张腔”。谭惟翰曾经这样评价张爱玲的小说：“第一是用词新鲜，第二色彩浓厚，第三譬喻巧妙。”（刘绍铭，2007：19）这三个特色构成了张爱玲小说语言特有的标记，辨识度极高。这种过目难忘的句子在《金锁记》中俯拾皆是。现举一例，以期管中窥豹。“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张爱玲，1992b：94）主人翁曹七巧被像铜钉一样的小金坠钉在门上，如同蝴蝶标本，暗示了她的命运和现实生活状态。形式的陌生化还表现在叙事创新上。她在传统传奇的叙事基础上，引入电影蒙太奇和西方心理分析的表现方法，新旧融合，独步文坛。

内容的陌生化表现在主题和思想上。张爱玲虽然继承了古代传奇的传统，但赋予传统崭新的内容。“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张爱玲，1992c：175）在她的小说中，读者在传奇中见到普通的人性，在普通的人性中上演着传奇。她的小说还解构颠覆了

关于“婚姻”“家庭”“亲情”“爱情”“是非”的传统神话，写出人生的苍凉与无奈，常常给读者出其不意的效果，让人回味无穷。例如：小叔子曾经让七巧朝思暮想，分家数年后小叔子上门找她，当她识破小叔子骗钱的伎俩，把他赶走时写道“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张爱玲，1992b：105）

（二）《金锁记》的阐释空间

作者型文本是无限复数文本，其意义是无限延伸扩展的。“作者型文本是永恒的现在，没有一个后来的语言能与之重叠，否则，就将无可避免地使它成为过去；作者型文本是正在书写的我们，此时世界永无停止的运行（世界作为功能）还没有被减损入口复数性、网络开放度和群体语言无穷尽的单一系统（意识形态，文类和评论）所妨碍、分割、阻挡和塑造。”（Barthes，1970：5）陈子善一本专著的题名即为《说不尽的张爱玲》，其小说的阐释空间可见一斑。许多中外名家学者著书立说，探究分析张爱玲及其文学文本，如高全之、夏志清、王德威、唐文标、水晶、余斌、陈子善、陈建华、池上贞子、邵迎建诸君等。学术论文更是汗牛充栋，是海内外硕博学位论文常见的选题，也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陈建华认为：“张爱玲兼有勃朗特与奥斯丁（Jane and Austin，1775—1817）之长，因其对人生有一种广大而透彻的理解。”（2022：249）仅就《金锁记》而言，在知网上可以搜索到论文614篇，学位论文78篇。小说中的主题、人物、语言风格、服饰等无一不是研究的话题，各种批评流派都能在其中找到话语资源，言说不尽，在学术界已经成为显学。根据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套用《金锁记》最后一句话“三十年前的人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言说《金锁记》的话语还没完，也完不了。

四、英译《金锁记》的翻译问题分析

翻译史上，文学翻译一直存在“形似”和“神似”之争，关于《金锁记》的英译问题也不例外。

《金锁记》的英译问题归纳为语言问题和读者反映问题，两者又是密切关联的：（1）“张爱玲的英译，‘信’有余而‘达’未及。”（葛校琴，2013：77）；（2）“但人物的对话，也许太中规中矩，听起来不自然。”（刘绍铭，2007：92）；（3）读者反映不佳。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大学教现代中国文学的刘绍铭，曾经问班上的学生对《金锁记》的看法，多数学生认为看不懂。下文就上述三点做一些探讨。

（一）英译《金锁记》的“信”和“达”

葛校琴对《金锁记》英译的批评源于夏志清对张爱玲译文的修改。现将原文和译文摘录如下：

例1. 原文：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着的脚，女人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身边的阑干，阑干把他们与众人隔开了。

张爱玲自译：The two of them walked side by side in the park in the autumn sun talking very little, each with a bit of the other's clothes and moving feet at the corner of the eyes and the fragrance of women's face powder and men's tobacco smell, this simple and lovely impression forming the railings alongside that separated them from the crowd.

夏志清改译：The two of them walked side by side in the park in the autumn sun, talking very little, each content with a partial view of the other's clothes and moving feet. The fragrance of her face powder and his tobacco smell served as invisible railings that separated them from the crowd.

（葛校琴，2013：76）

夏志清修改了四处张爱玲的译文。第一，将“眼角里带着一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着的脚”改译为“each content with a partial view of the other's clothes and moving feet”；第二，将原句一分为二，把“女人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身边的阑干”改译为“The fragrance of her face powder and his tobacco smell served as invisible railings that separated them from the crowd.”。第三，增加了形容词“invisible”。第四，省略了“this simple and lovely impression”。这样修改的好处是明显的，译文的文字流畅，语义变得显豁明了，减少

了读者的阅读难度。然而其损失也是巨大的。首先,“each content with”只是表明两个人物的一种心情。当时两个人的心情微妙复杂,改译限制了原文给予读者的想象空间。其次,“a partial view of”并不能表明是从眼角看到的,原文中暗示的女主人翁长安的害羞和男主人翁世舫的矜持在改译中荡然无存。再次,夏志清在“railings”前面增加了“invisible”这个形容词。本来原文用“railings”是个暗喻,是人物内心的写照。加了“invisible”和省略了“this simple and lovely impression”之后,坐实了“railing”这个词的虚假性,没有“this simple and lovely impression”更能体现张爱玲的文字匠心,没有了原文给人回味无穷的文字魅力。最后,夏志清将原译一分为二,使得句义一目了然,然而却减少了原文的寓意。长安和世舫的恋爱是长安悲惨一生的高光时刻,作者使用长句,表明作者希望延长这一幸福时光,或者暗示长安对这一时光的留恋。翻译文本类型理论都十分重视文学翻译中的文体形式。莱斯认为“在形式聚焦型文本中,原文的形式,而不是原文的内容决定译文的形式。”(Reiss, 2004: 37)从罗兰·巴特的文本理论来看,作者型文本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形式本身就是意义的表达,因此是具有无限含蓄意指的文本。因此作者型文本具有诗歌语言的特点。而“张爱玲可说是开启了散文实体的奇幻小说”(陈建华, 2022: 15)在翻译《金锁记》这类文本时,应该尽量保留原文的能指链,让译文闪现原文“纯粹的复数性”的含蓄意指光辉。“纯粹的复数性”是就系统的不封闭和无穷尽而言的,这是个开放的系统,这样的系统没有统一性。(屠友祥, 2015: 182)张爱玲的英译《金锁记》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夏志清对张爱玲译文的修改可以说有得有失,从罗兰·巴特文本理论角度来看是失大于得。

(二) 关于对话的翻译

在《金锁记》人物对话中,张爱玲使用了一些谚语和习语。张爱玲面临两难的选择:使用归化的方式还是使用异化的方式翻译人物对话中这些元素。归化让中国人变成外国人,异化给读者接受带来挑战。

例2. 小双道:“龙生龙,凤生凤,这话是有的。你还没听见她的谈吐呢!”

张爱玲自译:“Dragons breed dragons, phoenixes breeds phoenixes—as the sayings goes.”

“龙生龙凤生凤”根植于传统习俗,是民间智慧的结晶。张爱玲在翻译这一类习语时基本采用异化的方式,只有在她判断读者实在无法理解的情况下,才会使用“直译+注”的翻译形式。对话的描写最直接、生动地反映了人物的心理状态和个性特征。张爱玲在译文中试图再现中国人的形象以及他们的思维方式。直译成英语会加大读者的理解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理解。如果将这个习语翻译成“The apple does not fall far from the tree”,这样确实会让英语读者喜闻乐见,但中国人的嘴里冒出英语的习语,这还是中国人在说话吗?为了存真,张爱玲不惜牺牲畅达为代价。

从以上两个例句可以看出,张爱玲在自译《金锁记》时,最大限度地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尽量保持原文的能指链不间断,尽可能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这种翻译策略用在翻译《金锁记》这类作者型文本是恰当的,因为语言形式是作者型文本的灵魂,其意义超越了文本所要表达的信息。正如本雅明所说:“真正的翻译是透明的:它不遮蔽原文,不背光,而是让纯语言之光好像被译语加强了似的,更加完满地闪耀在原文之上。这主要通过字字对译传达句式才能达成;这也表明是字而不是句子才是翻译的原创元素。因为句子是源语前面的墙,而字字对译才是拱廊。”(Benjamin, 2012: 80)

(三) 读者反映

《金锁记》在被译成英文初期,读者把它当作读者型文本阅读,只关注情节故事和人物命运,如刘绍铭的美国学生这样评价曹七巧:“这个女人简直太可怕,太可恶,太邪恶了。”(刘绍铭, 2007: 89)然而他们并不深究曹七巧变态心理的社会家庭原因以及与此相匹配的语言艺术魅力,也就失去了获得更加深刻的阅读愉悦。《金锁记》作为一个作者型文本,对读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只是文本的消费者,不只在文本中猎奇,而是积极参与到文本意义的构建中。“作者的创造天才要求读者也必须有创造力,他们需要用他们的联想逻辑来填补文本的意义空缺。”(Leech and Short, 2001: 29)

张爱玲在英译《金锁记》中尽力保留中文的语言文化差异,再现一个真实中国家庭的社会生活。这种把读者带入异域,体验外国文化情景的努力违反了英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超出了他们的阅读舒适区,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因为长期以来,流畅的归化翻译是翻译界的规范,译者总是将外来的语言文化成分纳入自己的文化范畴,因此在英语世界张爱玲的异化翻译实践是超前的,比韦奴蒂提出的异化翻译理论早了二十多年。然而,超前并不是错误,而是其价值要等待后来者发现。

五、结论

《金锁记》是作者型文本,解释这样的文本不是“给它一个意义(多少是合理的,多少又有点随心所欲)而是欣赏什么样的复数构成了这个文本。”(Barthes, 1974)所谓的复数就是无穷无尽的复数意义,读者必须参与到文本意义的创造中,才能获得意义创造的极大乐趣。从认知的角度来说,阅读《金锁记》必须获得最大关联,而不是最佳关联,即读者花付出最大的认知努力,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中英文版本皆是如此,只有读者培养获取意义或者创造意义的能力才能做到这一点。正如霍华德(Howard)在罗兰·巴特的《S/Z》说明中提出的:意义与其说是文本给予的,不如说是自己获取的,我们获取的时候,必须明白我们参与的代价,否则我们的代价会更加昂贵。(Barthes, 1974: ix)

在译文中保留作者型文本复数的含蓄意指是译者艰难而重大的责任。如果为了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而让译文浅显易懂通顺流畅,这就将作者型文本变成了读者型文本,无疑会破坏原文的艺术价值,也剥夺了那些有阅读能力的读者获得极大阅读乐趣的机会。因此,张爱玲用异化的方式翻译《金锁记》,努力把译语读者带入外国文化情景,其良苦用心是值得称道的,尽管在某个时刻这样的译本并不为读者接受。然而这样的译本最终会闪现其光辉,英文《金锁记》进入企鹅现代经典便是明证。

参考文献

- [1] 巴特·罗兰. S/Z [M]. 屠友祥,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 [2] 陈建华. 爱与真的启示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3] 高全之. 张爱玲学 [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5.
- [4] 傅雷. 论张爱玲的小说 [M] // 张爱玲文集 (第四卷). 金宏达, 于青, 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
- [5] 葛校琴. “信”有余而“达”未及——从夏志清改张爱玲英译说起 [J]. 中国翻译, 2013 (1): 76-79.
- [6] 李欧梵. 张爱玲的英文问题 [J]. 现代中文学刊, 2010 (6): 88-92.
- [7] 刘绍铭. 到底是张爱玲 [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 [8] 宋以朗. 符立中 [C].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
- [9] 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 (第二卷) [M]. 金宏达, 于青, 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b.
- [10] 张爱玲. 张爱玲文集 (第四卷) [M]. 金宏达, 于青, 编.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6c.
- [11] 陈建华. 爱与真的启示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12] 屠友祥. “可写的”与“能引人写作的”及其他 [J]. 文艺理论研究, 2015 (6): 178-183.
- [13] 夏志清. 中国现代小说史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 [14] Barthes R. S/Z An Essay [M]. R. Miller (tran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4.
- [15] Benjamin W. The translator Task [C] //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awrence Venuti.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16] Cuddon J A. A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 and Literary Theory [Z].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92.
- [17] Leech G N, Michael H S. Style in Fiction: A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Fictional Prose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 [18] Lefevere 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 Sourcebook [C] .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19] Snell-Hornby M. The Tur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New paradigms or shifting viewpoints [M] .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 [20] Newmark P.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C] .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21] Reisse K. Translation Criticism——The Potentials and Limitations [M] .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

A Critical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Golden Cang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riterly Text

Li Guangro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Abstract: *The Golden Cangue* written by Eileen Chang is a classic novella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However, it was not recognized as such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when its English version rendered by the author herself first came out. The reason for its failure to win recognition in the English-speaking is a hot topic discussed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many scholars attributed it to Eileen Chang's English language inability. Based on Roland Barthes' text theor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Golden Cangue* is a writerly text, and defamiliarization is the artistic feature of this novella. It is mainly reflected in its innovation of content and form. This kind of text calls for the readers' participation in production of the text meaning. In translating this kind of text, the translator should try his best to keep the signifier chain of the original text and its unlimited plural connotations unchanged so that the target readers can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njoy the bliss in reading it. Therefore, the foreignization strategy adopted by Eileen Chang in her translation is appropriate. Foreignization translation may not meet the standard of fluency and challenges readers' reading habits, but it by no means shows Eileen Chang do not have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Key words: *Golden Cangue*; Writerly works; Defamiliarization; Foreignization